

普绪赫文丛 VI

臧建民 艾 以 主编

八十自省

王 孙 著



上海三联书店

普绪赫文丛 VI

臧建民 艾 以 主编

八十自省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十自省/王孙著.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2.

(普绪赫文丛/臧建民, 艾以主编, 第6辑)

ISBN 978-7-5426-3916-5

I. ①八…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95911号

普绪赫文丛VI(八十自省)

著 者 王 孙

责任编辑 钱震华

特约编辑 黎 迦

何志向

装帧设计 张新力

出版发行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中国上海市都市路4855号

<http://www.sjpc1932.com>

E-mail: shsanlian@yahoo.com.cn

印 刷 上海新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2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90×1240 1/32

字 数 2600千字

印 张 120.25

书 号 ISBN 978-7-5426-3916-5/I · 616

定 价 300.00元(全10册)

总 序

近几年,上海作家协会着力建设服务型作协,为作家多办实事和办好实事,推出了一系列举措,其中一项就是为作家的作品出版提供支持和服 务,《普绪赫文丛》就是一例。以“普绪赫”命名的文丛受到了作家们的欢迎。收进《普绪赫文丛》的作品,作者或是作协会员或是上海文学创作中心注册作家,他们热爱并坚持文学写作,少则一二十年,多则五六十年,为文学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普绪赫是上海作协花园里的一尊雕像,这个花园被称为爱神花园。早在 1926 年间,匈牙利籍建筑设计大师邬达克在设计方案中,就已将普绪赫喷泉作为花园的象征,而普绪赫则成了爱神花园的灵魂。在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她总是会出现在那些重要的地方,由此普绪赫也成为上海作协的标志。

在希腊神话中,普绪赫是人类灵魂的化身。普绪赫为了争取幸福,她绝不服从万能的神的安排,在经受磨难之后终于如愿以偿,与爱神丘比特结为恩爱夫妻,获得了幸福。普绪赫不畏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来自于她的坚定信念。由此,她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创造了属于人的理想世界。这个神话寓意深远,作为

艺术形象普绪赫展示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完美。希腊文里普绪赫的意思是蝴蝶和灵魂。古希腊人认为,从蛹里钻出来的蝴蝶,代表人的不朽的灵魂离开了躯体,经过痛苦和不幸而净化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蝴蝶在痛苦、长久的净化后拥有的美丽和动人,恰是人的灵魂即精神的形象写照。

文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关系着民族的灵魂,犹如人类灵魂的灯塔。文学要承当社会使命,事关着人类的文明,健康向上的文学是人类的精神家园。作家的创造性劳动,展示的是人类的精神世界,带给读者的精神力量无疑是巨大的。值得肯定的是《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他们对文学持有坚定信念,在文学道路上都有过长期探索和不懈追求,他们风格迥异的作品,从各个侧面表现人生,描写社会和自然,研究探讨文学中的各种规律,表达他们独特的主观见解和深刻的内心感受,给予我们审美感觉、艺术魅力和理性反思,使我们感悟到人生真谛和心灵启迪,伴随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前进。

普绪赫是不朽的,她永远透射出青春的力量。文学是不朽的,她永远引领我们在精神的世界里前行。但愿《普绪赫文丛》的作者们,文学之树常青,有更多的作品问世。

臧建民

上海市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秘书长

自序

照理说年过八十可算得高寿了,我离八十还不到一年,也可以说是高寿了。但既是高寿,总得留点东西给后人,因此就有了这本自省及其他。

回顾我这一生八十年,除去童年十年间比较清闲安定以外,其余的近七十年,都在战乱、贫困、迁移、坎坷中度过的。在我青壮年宝贵时期(26岁至47岁)又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算来真正工作时间只有二十三年,其他时间都在劳动、打杂、批斗中度过的,因此没有什么大事可记,而且我这一生又都在一个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度过的,就更没有什么可记的了。但在我这平反后的二十三年间,由于我个人想追回失去的岁月,在工作中确实有点拼命三郎的味道,算来共编辑出版了近90本书,而把我的业余时间几乎都用上去了,连我设想好的小说素材都没有时间去写。在我所编的书中,其中较为著名的有《方令孺散文选集》、《鲁彦散文集》、《许杰散文选集》、《新月散文十八家》、《中国现代幽默文选》、《刘海粟传》、《中国古代散文精粹类编》、《中国近代散文精粹类编》、《中国现代散文精粹类编》以及《中国当代散文精粹类编》,其中每编另有分册共十册,共计四十册,其中

《中国现代散文精粹类编》和《刘海粟传》还获得华东地区文艺奖。此外,我又独自一人先后共选编了1979年至2000年上海唯一的共六册的《上海杂文选》,以及《上海杂文家自选丛书》共八册,还有《张澜传》等等,编的书该算不少了,但都是别人的“嫁衣”,自己却没有一本书问世。现在我又患了重病,自知在世已无多日,就把能够搜集到的发表过的和未发表的文章凑成一本,题目想来想去就叫做《八十自省》吧,目的是想留点东西给后人,尽一点“沧海之一粟,留鳞爪与雪泥”的意思。

在此,还想提一下几篇写于七十年代的未曾发表的旧作《北行游记》以及《杭州游记》和《姑苏游记》等,从中可以看出“文革”中的种种文化禁区,以及当时的风俗人情等等。

此外,我还为宁夏人民出版社写过一本小册子《海瑞》,回顾我一生的文字工作,大致就是这些了。

时光如白驹过隙,弹指间八十年将近了。惭愧得很,一生只留下薄薄这么一本小书,但希望能让读者从中得到点可用的资料,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2010年3月5日

简 叙

我本名王聿祥,后来在读大学时和我的女朋友孙静华(即我现在的妻子)共同构思、发表了一篇文章,在署名时即选用了两人的姓作为笔名,后来即以此作为我的笔名,沿用至今,以致后来有许多熟人却把我的本名给忘掉了。

我生于1931年12月13日,是我父亲的抱养子。我的生母姓赵,据说人生得比较矮胖,其他就都无印象了。自从我被抱回家中,认我的养母为生母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生母。据说我的养母在认领我之前还曾假装过怀孕的样子,认领我之后也曾大摆喜筵以示庆祝。因为我的养母姓马,是回族,没有生育,在认领我之前就和我父亲有过协议,要我入教(即转为回族)^①,今后一切生活方式、习惯、宗教信仰皆按回族办理,以致连我的籍贯也由我父亲的江苏睢宁改为我养母的籍贯江苏淮阴了。我的民族成分也由原来的汉族改为现在的回族了。

至于我的本族王氏,最早是定居在山东琅玕的。大约在我

^① 当时的政策,从未承认回民是个民族,只承认它是个宗教,凡是回民一律称为教门、教民。

父亲十世祖先时，由山东迁移到江苏睢宁的高作镇王行乡定居下来，一直繁衍至今。我的祖父懿环公是个下中农，生活比较贫苦，他共生有我父亲等弟兄三人，另外还有我姑母一人。我父亲排行老二，按家谱排行属范字辈，因而起名叫范矩，字绳之。因为当时我们家比较贫穷，弟兄三人均未读书，在家放牛割草，干些杂活。其中只有我父亲喜欢读书，经常在干农活空闲时，站在私塾窗外偷听，时间久了就引起了当时的教书先生张树黄的关注，问其原因，才知道是由于家庭贫穷无力交学费书费所致。张先生出于对好学者的关爱，表示可以不收学费，并供给书籍簿册，让他入学，但我祖父起先并不同意，认为家中因此要少了一个半劳力，再说农民读书又有什么用呢，后来经张树黄先生极力劝导，并说识字会算，就是记记账也是有用的，这样祖父才勉强同意父亲入学。

父亲入学后，学习非常刻苦努力，除去帮助老师干一些杂活外，经常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后来这个私塾改为完全小学，父亲以 20 岁的年纪毕业于这所学校，但当时父亲的头发几乎都脱落了，可见他当时用功的程度。

不久，中国法政大学在南京招生，我父亲借了别人的中学文凭，用了半年时间补课，终于考取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法政专科学校，但他本人也因操劳过度，以致吐血，大病了一场。后来他终于在 1917 年毕业于这所学校，取得了学位。

我父亲毕业后，起先在教育部门工作。曾经担任过淮阴师范和私立成志中学的语文教师。由于我父亲语文根底好，做人又正派，在当时苏北教育界颇有点名气，他在当时有一副对联：“人情薄似水，我志稳如山”，颇赢得当时社会的赞誉，一时广为传诵。（著名作家陈白尘即是当年成志中学的学生，在他的回忆

录中曾经有不少篇幅提到过我父亲。)后来又担任过江西九江法院和苏州高等法院的书记官。当时正是审判七君子事件的时候,我父亲恰逢其事,亲眼看见过七君子的风采。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苏州高等法院对员工采取停薪留职的办法,我们全家只好乘火车逃难回到我母亲的家乡江苏淮阴,从此就再也没有从事政治方面的工作。

在淮阴我父亲赋闲的时候,正好遇见他以前的学生张翼,他正在淮阴招兵,要筹建当时江苏省长韩德勤要建立的江苏省保安第二旅。他见了我父亲后黏住我父亲帮他工作,并且委派我父亲为他的私人少校秘书,于是我们全家就跟着他先后辗转于苏北的东台、姜堰、栟茶等地,直到张翼被捕处决后,我们才逃到上海。

原来在黄桥事变前夕,张翼的二旅和新四军已有联络,事情被发现后立即被韩德勤派人抓捕,并且在短短一个月间就被处决,罪名就是“通共”。由于我父亲和张翼的关系是尽人皆知的,因此我们全家闻讯后,立即连夜赶往天生港,乘船逃往上海,投奔在租界二马路(即今九江路)开中药店的一位姓王的本家。由于当时上海是孤岛,日本人暂时没有进租界,父亲手头还有点积蓄,生活还可以对付,我当时先后就读于慕贞女子小学和景海小学。由于当时的小学大半为读半天的,我父亲当时又正值空闲时期,于是就带我到附近几大公司游艺场和我住家对面的大舞台看京剧。这一时期我看了不少连台本戏,像天蟾舞台的《黄天霸》、共舞台的《西游记》,还有大舞台的《枪毙阎瑞生》等等,尤其令我佩服的是当时的著名红生林树森的关公,以至回到家中经常拿起一根棍子模仿林的动作,常常引得家人开怀大笑。

可是这种醉生梦死的日子被太平洋珍珠港事变的枪声打破

了。自此以后，我们要排队买户口米，日本人还要经常封锁道路，父亲的积蓄也快花完了，因此父亲打算回到他自己的家乡开个学馆，教学生们古文来维持生活，于是决定于1942年春天动身回乡。

在回乡的路上，父亲遇到了当时被派往睢宁县任伪县长的张哲生，交谈之下，他了解我父亲是当地人，又在外做过多年的事，就一定要黏住我父亲协助他回乡工作，当时我父亲被他盯得没有办法，就说容他考虑一个月再说。当时睢宁县处于沦陷、国统、解放三区交界的地区，各方势力均有代表人物或明或暗地驻在县城里。当时解放区的代表吴彦求同志恰恰是我父亲大学里的同学又是同乡（此人解放后曾任安徽省政协副主席），我父亲就把当时的情况向他讲述了一遍，想听听他的意见。他听后表示，我父亲可以就任伪职，做个外白里红的两面派人物，反正这事他已知道，他将向组织汇报。这样他可以多一条情报来源，便中也可以为沦陷区人民做一些好事。得到他的同意后，我父亲就担任了伪睢宁县第二区区长的职务，驻地为高作镇。记得在就职的当天，吴彦求同志还特地派人送来一副珂罗版影印的孙中山送给蒋介石的对联：“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意思是要我父亲勿忘记正气和完人。此后，在我们家中经常有解放区的来人住宿，或与外面来人联系，几乎成为解放区的一个联络点。

我当时就读于二区的区公所所在地高作镇模范小学，并在那里小学毕业，那是1943年暑假的事情。

但不久，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可能有人告密，我父亲被解职了，想去徐州找朋友谋个职务。临走的那天，全镇的居民还特地制作了一把万民伞，并在门前摆上桌子，上面放一碗清水和一面

镜子，表示清如水、明如镜的意思，有的刚在这里摆完桌子，立即又将桌子摆到下一个地方，是很明显带有“打秋风”的意思，但也有些是诚心诚意地称赞我父亲政绩的意思。

到徐州以后，父亲并没有找到职业，半年后回到我母亲的家乡淮阴，在一位当伪淮阴县戒烟局长的本家那里谋了个秘书的职务，工资刚够生活糊口。当时我则在徐州教会中学听听中学读初一，我又趁机游览了云龙山、九里山、放鹤亭、洗马台等名胜古迹，到了1944年的暑假我也回到了淮阴，在淮阴县立中学读初二。

这时已是1944年，抗日战争快要胜利了。果然不久，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不久，新四军就抢先占领了淮阴，并成立了苏皖边区政府，同时也成立了淮阴市政府，市长是李一氓。父亲由于是当地的著名士绅，再加上过去在睢宁县任伪区长时已和新四军有过联系，就被任命为苏皖边区政府参议员，同时又被任命为淮阴市文教厅副厅长。

这时的淮阴已成为苏北的重要城市，许多机关、报社（《解放日报》）都设在这里，还有刚成立不久的苏中建设大学，一时可谓群贤毕至、冠盖云集。但国民党岂能容忍共产党占据它的老巢地盘，于是就于当年11月对它发起进攻。当时边区政府也准备放弃淮阴，坚守一些有群众基础的城市，于是他们就找我父亲谈话，除去谈一些当前形势外，就对我父亲明确地说：淮阴是守不住了，准备向山东方面撤退。如果我父亲愿意和他们一起撤退，他们表示欢迎，如果我父亲有困难不能和他们同行，他们也不勉强，不过希望不要留在当地，否则会因为“通共”而带来许多麻烦。我父亲当时已五十多岁了，体力上不如青年，再加上还有不识字的母亲和正在读初中的我，表示有困难不能跟随他们北上。

他们表示理解,后来又派人送来约值十担米的银元,算是路费,并要我们尽早秘密地离开。于是我父亲就在第二天夜里,雇了一条仅可容身的小民船,在船内屈身弯腰度过了三天两夜,终于到达当时的国统区扬州。

到达扬州后,由于父亲曾有“通共”的嫌疑,等了半年始终没有找到职业。后来才不得已投靠在上海长寿路纺织厂做工的姨母,六口人挤在一间6平方米的亭子间内,其境况可想而知了。一直到了1949年,父亲偶然遇到过去在睢宁教书的老朋友张虚候,他正在敬业中学教语文,知道我父亲失业就主动把他所教的语文课让一半给我父亲,这样失业了近三年的父亲终于有了一份可以养活两三个人的工作。不久,上海解放了,父亲才由原来的半个代课老师转为正式老师,才算有了一份正式的工作。

我来到上海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曾经辍学一年,后来才考入由当时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方治挂名主办的、并有奖学金的建华初级中学,后来由于建华中学只办到高一为止,就又转到由地下党主办的私立上海交通大学,直到1950年毕业为止。

由于我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教育,对语文颇感兴趣,加上我在辍学一年期间,又看了大量租借来的各种小说(大多为“五四”以来的,就决心要考大学的中文系,将来要做个作家。于是就在暑假中积极准备各种功课,结果在发榜时,我同时考取了三所大学:大夏大学(即今日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土木工程系,这是听了父亲的建议,认为文科没有前途才报考的;大同大学中文系以及复旦大学中文系。由于前两者是私立大学,学费比较贵,每学期要近两百个折实单位(相当于今天的两千元人民币)还要另加自己买仪器等额外费用。后者是国立的,学费比较便宜,只要十六个折实单位,而且吃饭不要钱,同时名气又响,是国立的大学,于

是就决定先到复旦大学中文系报到试试。当时接待我的是蒋天枢老师,一听口音,蒋先生也是苏北睢宁一带的,就更加坚定了我的亲切感,于是就决定留在复旦中文系读书了。当时在复旦中文系教书的名师很多,而且还都亲自上讲台授课,如教语文课的章靳以,教语法课的郭绍虞,教历史课的朱东润,教诗歌的汪静之,教散文的方令孺,教文学史的刘大杰,教小说的许杰,以及后来与我关系较深的贾植芳教外国文学等等,这些都使我受益不少。1954年我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即被分配到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即后来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直至1991年退休。

这里我要重点谈一些与贾植芳老师的关系,由于我与他接触较多,因而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时我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人,并说我曾企图为他通风报信,并于当时(星期天)准备开会时,我准备不参加开会去他家为他通报情况。实际情况是当天(星期日)我们约好到他家闲聊,结果会后我去到他家时,复旦保卫科的人已经在他家坐等了,于是我被定为胡风思想影响分子,1957年又被定为二类右派,下放庙行农光大队二队监督劳动,工资由65元减为生活费35元,从此就当了一个从事各种脏臭劳动的农民了。

在庙行农村劳动到1962年年底,由于单位里勤杂工缺人,我爱人生病又住到疗养所,孩子多无人照顾,就把我调回原单位当勤杂工,每天早晨要早一小时到,要先泡开水,做公共地区的清洁工作,然后就是送信,做杂务工等等。1964年上海文艺出版社撤销,分为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和上海文化出版社,我又被分配至文化出版社做勤杂工。一直干到1966年春节前夕,方始为我摘去右派帽子。摘去帽子后原来要调动我的工作,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暂停了,故仍在传达室劳动。1969年林彪一

号通令下来,我被紧急疏散去奉贤柘林镇,住朱天才家,1970年3月转入干校六连,8月份又宣布为战高温人员,离开干校去自行车飞轮厂劳动,因身体不适应,有严重高血压,于1973年5月1日调至离家较近的上海电扇厂,先敲洋元,后至仓库捡垃圾,1976年7月15日被批准正式留厂当工人。1978年8月调回原单位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务室工作,1979年1月26日正式宣布我右派改正,恢复原来级别,1979年5月调至上海文艺出版社第二编辑室任编辑工作,直到1991年退休。由于我手头工作尚未结束,结果又返聘至1996年,至此,我正式的工作终于结束了。

目 录

自 序	1
简 叙	1

• 第一辑 书评及其他 •

甜苦兼味话编辑	3
嫁衣生涯别有情	10
编辑与导读	12
风飘云逸话“新月”	14
正直的人格,纯真的文风——《许杰散文选集》(增订本)读后 ...	25
《中国现代十家幽默文选》前言	38
开拓者辛勤的果实——柯蓝同志的新版《早霞短笛》读后 ...	43
《白马湖散文十三家》	50
重版《呼吸》读后	56
读彭柏山《战火中的书简》	60
憔悴斯人,哀民多艰——鲁彦和他的散文	64
别具匠心的选集——《中国现代散文精粹类编》读后	68

一位民主老战士的平淡一生——读《夏丏尊传》	70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略论陶诗在文学史上的 地位及其艺术特点	74
略谈《望海潮》的艺术表现手法	83
散文纵横谈	87
散文之花为何不盛？——对目前散文创作的一些看法	104
“推理文艺”小议	110
漫话真实性及其他	114
皮毛说——浅谈对“文艺为人民服务”的看法	117
蒙太奇与古诗	123
风雨大禹陵	126
复旦生活琐忆	131
许杰登报卖书始末	138
怀念恩师贾植芳	144
编后漫话杂文	148
死大于法?!	151
说“堵向”	154
说“廉”话“耻”	156
乱弹“调动积极性”	159

• 第二辑 北行游记 •

北行游记(1976年9月22日—10月14日)	165
-------------------------------	-----

• 第三辑 杭州游记 •

杭州游记(1977年6月7日—6月13日)	247
-----------------------------	-----